

都市
与文化
译丛

后现代 都市状况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上海教育出版社



Michael J. Dear 著 李小科等 译

后现代都市状况

李小科 王全瑞 译
杨永霞 高 莎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Michael Dear 2000

The right of Michael Dear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2000

Reprinted 2000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published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都市状况 / (美) 迪尔 (Dear, M. J.) 著; 李小科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12
ISBN 7-5320-9568-1

I. 后... II. ①迪... ②李... III. 城市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309号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后现代都市状况

Michael J. Dear 著

李小科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7 插页4 字数360,000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本

ISBN 7-5320-9568-1/C·0008 定价: 34.00元

译丛总序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

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被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就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

操控活动。”^①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①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塑造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型塑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

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设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 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

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主要发表关注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2004年3月

前言

本书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与后现代主义共存,尤其是与一直以来对西方思想行为产生着深刻影响的文化运动在道德、理论以及政治上所产生的后果之间的共存。本书还讨论城市,以及在 21 世纪地球村中兴起的城市主义所具有的种种形式。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两个问题置于被我称之为“后现代城市规划”的标题之下来进行。

在当前情况下,聚焦后现代主义可谓正是正合时宜。原因有二,首先,全球政治经济已步入一个日趋重构与联合的不稳定时期。旧格局被破坏,新格局正在形成,新格局包括与非工业化、环境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日益减损的民主主义、网络空间、邻避主义(NIMBY),以及少数人所领导的社会运动等。伴随着这些变化,不同类型的城市主义应运而生。城市主义以边缘城市、门控社区以及新“世界城市”的全球等级制度为特点,其中等级制度是理解迅速发展的地缘政治秩序的关键。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力图来理解这种重构。其次,21 世纪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思潮鼓励和要求人们以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后现代主义建立在对差异性和基本不确定性的较为敏感的基础之上,它对我们的解读、表现以及作选择的方式提出了质疑。结果,先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拥有了评议权、发言权。不管怎样,现存的权威都要面对彻底审查。

毋庸讳言,后现代主义发起的攻击遭到了顽强抵抗,这种阻力和抵抗主要来自那些为后现代主义包含的内容所威胁的人群。右翼评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荒谬的政治正确性;

左翼评论家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包含对经济发展有着严重危害的、反进步的多元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成果正受到既定权威势力的威胁,既非华表的虚饰,也不是为招人注意。我认为,如若后现代主义思潮消亡,那将意味着陈腐过时的真理的胜利。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学术界已流行几十年,然而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偏见依然是阴魂不散,仍把对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视为一种越轨行为。谁若信奉后现代主义,他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无望中的颓废、过时、术语上的不确定等。这类批评主义往往来自怀有敌意或人云亦云者之流;无论如何,本书所作的批评可能引起一场争论。

城市生活的主题是差异的主题。

——理查德·洛德里吉兹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历史总能成功地诉诸于通俗的想象,而地理却不能。大家都理解并且尊重穷根溯源的活动,然而,在追溯空间起源这一问题上却另当别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全球大部分地区地理文盲程度的高低来区别对待)。似乎人类已穷尽了对世界的探索,万物都有本有源,因此,再也不需要地理想象了。然而,儿童对于地域(高山、长河等)的好奇,却恰如其分地昭示出有关空间结构和空间存在中最深奥的问题。

鉴于后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格外强调,地理学家对后现代主义宠爱有加。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展示出空间在社会思想中的伟大意义,只不过这种重申工作姗姗来迟。一些分析家提出,我们正在目睹后现代超空间的诞生。这种超空间是对旧有社会时空结构所做的一种延伸和重组,使其成为到目前为止我

们还只能朦胧觉察到的一种空间。我作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释这一假定的超空间(或多维空间)。我将通过揭露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城市主义的复杂的往事,以此来强调空间、地点以及位置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城市一直是全球秩序最主要的直观表现。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么全球重构的步伐和力度在 20 世纪后半期也有所加强。像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等术语,它们的广泛流行代表着向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日趋形成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挑战、格斗的尝试。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围绕私有化展开的争论标志着人们从根本上对公共事业的优势存在着不信任,也标志着公民权利义务需要重新加以定义。同时,各种潜在和新兴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间的疆界提出质疑。因为,冷战政治对峙的结束使得这种界限越来越不明显,而多国资本实际上已将这种疆界给抹去。国际及国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两极化,清楚地反映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腐化与犯罪当中。面对我们这个星球自然经济系统消亡的危险,人们终于开始慎重地思考、度测,在摸索、探求中行进。

为搞清楚这一复杂的全球动态,本书很多章节将关注洛杉矶以及更大范围的南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我再也想象不出有比南加利福尼亚更适合于生活与工作的地方了。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首次造访那个地区时(我在一个炎热的 10 月参观了奥兰治城),根本读不懂它;而到 1986 年时,我已深深迷恋上了那座城市及其建筑景观,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任命。为与詹妮弗·伍尔契合作一本书,我针对无家可归者展开了调研和理论工作。通过人行道、街头宿营地、地下通道等所有这些无家可归者可用以栖身的地方,我们

认识了洛杉矶。然后,像现在一样,我欣然接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坐落于洛杉矶中南部这一事实;每天,渴望工作的动力都适时地提醒我,在这座城市里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意这所大学坐落于其他任何地方。当1992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附近的街道上发生了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城市市民暴乱时,我的反应是,我要加强与这座城市及其人民的联系,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融入到它的各种人群当中。1995年,我很荣幸地被指派负责创办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南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以此致力于有关地区未来的集体的讨论和对话。

约耳·伽鲁在其对边缘城市所做的研究中,一开始就告诉人们南加利福尼亚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每一座处在尚建阶段的美国城市,都在按洛杉矶的模式发展。”对包括菲尼克斯和亚特兰大在内的很多美国南部及西南部各州城市来说,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十分准确的;甚至像西雅图、芝加哥一类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如今也打上了洛杉矶化的印迹——同样,其很多居民对这种趋势持一种警觉和鄙视的混合心态。伽鲁对此还做了补充,他认为,很多其他世界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与其早期保守的工业大都市形态相比,更多地仿照了洛杉矶城。然而,直到近期,大多数城市学家才开始关注洛杉矶。作为在美国最不受重视的大都市,洛杉矶一直被当作美国城市动态法规的特例来加以描绘,被当作遥远的大陆边缘地带的一项独特发明来加以描绘。无论业内人士还是外界人士,都持这种态度;并且由于艺术、文学、影视以及电台工作者刻意地强调洛杉矶城市形象中畸变的一面,使得这种态度越来越明显。如果我们能将好莱坞所充斥的魔幻奇观搁置一边,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而是去更加认真、透彻地做一分析,我们又会得出一种什么样的结论呢?南加

利福尼亚州想向我们讲述什么？

很多人认为，洛杉矶是一座多中心、多文化、多语言的大都市，是当代城市化的原型。作为太平洋海岸的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主要城市，洛杉矶正同时经历和体验着非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在这座城市里，社会经济两极分化的程度剧烈到甚至难以驾驭的地步。（据说）在那儿，光彩照人的“第一世界”高高凌驾于几近枯竭的“第三世界”之上。作为主题公园的汇合地，在那里，各种口味——工业社团、休闲娱乐、寻欢作乐等都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包装花哨轻浮的梦幻景色的存在，展示了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颇具诱惑力的消费方式。不过，同等重要的是，他们也编织出了一种多文化的镶嵌图案。在这一图案上，已有的社会契约千疮百孔、处境岌岌可危。1992年，社会经济的急剧分化、代议政治中出现的危机、种族主义、社区的分崩离析等，导致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市民暴动。洛杉矶城毁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自然环境。

接下来，我重点强调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意向性问题，即为什么某些关键人物能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地点走到一起，来创造城市的空间；且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土地使用规划的机构对以往（或将来）的城市进程有特殊的指导作用。我对城市规划的关注类似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主张。他认为，人造环境的建筑学是后现代文化中有优先权的美学，因为（在他看来）它提示了一种与跨国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两个因素的支配：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不断提出的要求；二是国家要对矛盾冲突以及对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所引发的危机做出反应。在城市产生与形成过程中，市民社

会—国家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特点由形形色色的私人公司作决定、拿主意;另一方面,对财富的无穷无尽的追求威胁着社会关系结构(尽管有时这种调解会被抵制),国家一直致力于保护受到威胁的社会结构。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初衷,就是改变资本主义土地及财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效性及不平等性,慢慢又发展成为对健康有序的城市实际追求,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论叙说。两种传统都在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城市发展规划中得到集中体现(如在维也纳的莱茵斯特拉斯以及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

政府一直是一个尚待完善的、有争议的形态,在当前国家—市民社会的这种对立统一中,钟摆决然偏离国家。在这个资源短缺、经济衰退的世界上,各级政府都积极寻求企业家、开发商的支持,理性规划的图景最终消解在支离破碎的私有化的围地当中,这些被包围领土越来越鲜明地标示出城市的前景。长久以来,城市叙说中的理想主义一直为一种工具主义所遮拦,这种工具主义将城市规划的理想降格为土地及财产发展市场上的技术辅助物。被抛离其思想意识及精神支撑物的城市规划可能已经变得不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后现代规划”这一术语也可能已成为矛盾修饰法。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公共意向性确实从城市景观中被抹掉,那么在下一个千年里,城市可能依然是一种非理想的、不具持续性的前沿阵地,在那里,不明事理的部队仍将在黑暗中继续上演他们的械斗。

理论是不错,但它无法阻止事情的存在。

——《查考特致弗洛伊德》

社会理论试图从根本上让日常生活变得简单易懂。很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可追溯到启蒙传统,包括那些从传统的角度来确定自己身份的理论。启蒙运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合理性、基本原则以及普遍真理的探求。大多数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认定,有某种形式的普遍法则存在,不管这些法则是适用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还是适用于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对这一信仰提出挑战的正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汇,这一术语如同为五彩贝壳所包装,使得它更难于理解。它曾一度被用来指内衣、冰激凌以及哲学。近几十年来,这一词汇的意义和适用场合更是花样繁多,批评家们非常愉悦地(并且是不知不觉中)抓住了这一事实。然而无论如何,对那些意欲承认这一词汇的人来说,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产生脉络;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似乎与19世纪6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有着难以理清的继承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可析辨出以下三点:

(1) 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文化和文体实践,它们内部以及它们自身都是非常有趣的;

(2) 这种实践的总和,被视为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聚合;

(3) 一种与启蒙运动思想准则(尤其是某种单一的文化信条霸权)相对立的哲学及方法论话语。

这三种方法中都蕴含着“彻底决裂”这一观念,即已往趋势与将来趋势之间的不连续性(不管是文化的、政治经济的还是哲学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被遮掩的核心问题是将同时性理论化的问题,是将当代生活中令人眩晕的混乱理清弄懂的问题。

本书中,我将对后现代思想从这样三个维度加以论述,具体来说就是:城市的文化人造物;后现代性时代的崛起,以及思维方式的改革。我始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认识的本质,它那值得商讨的、偶然的一面,即确信获得真理与界定真理的过程和参与其中的人密切相关。我可以诠释伏尔泰的学说,认为理论只不过是知识分子们所一致达成的谎言而已。然而,我还是不愿意煽风点火,只是想表明,面对种种“元叙述”的超级假说,我宁愿保持怀疑态度,相反承认和接受彻底的不可通约性,正是这种不可通约性把处于相互竞争和对立状态的理论观点加以分离,且划定出可加以确认的界限,从而使得各种理论具有了清晰的框架。从这一方面讲,我赞成伊赛亚·柏林的观点,他毕其一生去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具有合法性的人类价值观、理想观不一定要分出个你高我低或使一方屈从于另一方。

我还将涉及到表现危机,即我们在观察和描绘周围世界时难免会采取不正确的方法。解构主义者已注意到了所有篇章陈述(不管通过采取何种方式,书面、胶片、口述等)中权威性的本质的问题。他们揭示出,在任何篇章中缺省与在场同等重要,一旦文章定稿,其影响将无法驾驭。相反,读者阅读文章时,一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会油然而起;作者、文章、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或许永远都无法妥善解决的解释性张力。

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针对不同观点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自己那充满智慧的观点,或是形成针对对手弱点的可笑误传。现在,我确信很多学者只不过不愿寻求相互冲突观点间的共同基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会导致妥协让步,甚至牺牲自己的知识权威性。然而,这不能成为其他人的借口。我们首先应承认:观察事物的不同方